

卡夫卡与文学机器

——浅析德勒兹与瓜塔里的文学理论

朱立元（西南交大讲座教授，复旦大学中文系）

胡新宇（复旦大学中文系）

当代西方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在对德勒兹思想的论述中曾经指出：“在所谓‘后现代主义’的杰出思想家中，德勒兹是在自己的哲学中赋予马克思以至重要地位的惟一一位，他的后期著述中最激动人心的事件即是与马克思思想的碰撞”^①。这里所谓的后期著述，指的是德勒兹与原精神分析学家菲利克斯·瓜塔里合作出版的两卷本《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症》《卡夫卡——为少数文学而作》（下简称《卡夫卡》）以及《什么是哲学？》等著作。在这些著作尤其是前两者中，德勒兹发展了他早期思想中对差异、生成等元素的强调，与瓜塔里一起提出了反精神分析学，并进一步应用马克思主义、尼采哲学等对当代的资本主义社会作出了诊断与批判。相对于国内外理论界多是从政治学角度探讨德勒兹与马克思的关系^②，本文拟着重讨论德勒兹“后期著述”中这一关系所体现的文学理论指向。纵观德勒兹与瓜塔里合作出版的著作，《反俄狄浦斯》与《千高原》两书组成的《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症》卷帙浩繁，理论线索繁多，新概念层出不穷，这就为我们对两人文学理论的解读带来了困难。笔者认为，在这两本著作之间出版的《卡夫卡》一书，可以作为我们解读的可靠出发点。这是因为：首先，从写作及出版时间上看，《卡夫卡》一书处于上述两本著作之间，是承前启后的力作，一方面，它充分发展了《反俄狄浦斯》中提出的欲望生产与社

^① 参考詹姆逊《德勒兹思想中的马克思主义与二元论》一文。Fredric Jameson, *Marxism and Dualism in Deleuze*, *South Atlantic Quarterly*, Summer97, Vol. 96 Issue 3. 中译本见王逢振主编：《詹姆逊文集》第4卷《新马克思主义》，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② 这其中 Routledge 出版社出版的《德勒兹，马克思与政治学》（*Deleuze, Marx and Politics*，作者 Nicholas Thoburn）、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 Paul Patton 教授的《德勒兹与政治》（*Deleuze and the Political*）、美国雪城大学 Gregg Lambert 教授的《谁害怕德勒兹与瓜塔里？——一种政治语用学介绍》等书都是近来出版的值得注意的著作。

会生产理论,而另一方面,它又为《千高原》中提出的生成论美学等开辟了道路;其次,《卡夫卡》一书作为独立的文学理论著作,不同于上述两卷本著作中对文学艺术等问题的片段、零星论述,相反,它比较充分而集中地展示了德勒兹与瓜塔里文学理论的核心与精华。从这两种考虑出发,对《卡夫卡》一书的解读可以使我们举一反三、事半功倍地进入和理解德勒兹与瓜塔里的文学理论。

—

我们认为,考察德勒兹与瓜塔里的文学理论,应当从《反俄狄浦斯》出发。因为在这本著作中,德勒兹与瓜塔里从欲望出发,在机器这一核心概念之上提出了他们的欲望生产与社会生产理论,而这正是两位作者文学理论的思想基础。

在《反俄狄浦斯》中,德勒兹与瓜塔里认为,自柏拉图以来经由康德一直到弗洛伊德的整个西方思想史,都误解了欲望的本质。欲望不是人们过去所认为的匮乏,它不缺少任何对象或目标,因而不是否定性的,相反,欲望本身即是肯定性的、生产性的。这是他们欲望生产理论的出发点。他们之所以要“反俄狄浦斯”,乃是基于以下两点考虑:首先,精神分析通过将欲望与外部禁制联系在一起,把欲望的本质定义为匮乏,并且受超越性俄狄浦斯律法的统治;与此相反,他们则认为欲望与外部禁制无关,只是内在性平面上的一种实验进程;其次,欲望虽然在精神分析学中作为力量被定位在个体身上,但这种力量是非生发性的,只有在经过压抑、升华等操作之后才能被社会所“采纳”,这种力量在本质上是无能的,而德勒兹与瓜塔里则将欲望转换为一种社会力量,强调“社会领域直接由欲望来投注(invest),它是历史地决定了的欲望产品,并且为了涌入并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进行投注,里比多不需要任何中介或升华,不需要任何心理操作、任何变形,只有欲望和社会因素,别无其他”。^①这正是两位作者所描述的欲望生产与社会生产理论的核心所在。他们认为,以弗洛伊德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心理学至少在一点上是正确的,那就是弗洛伊德发现了欲望的主体性抽象本质,这就好像以里卡多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发现了劳动力的主体性抽象本质。这种抽象的、主体性的欲望或劳动力脱离了任何建立在客体性之上的表象体制,欲望或劳动力只是在生产的过程中在外部对象上实现自己。但反过来,德勒兹与瓜塔

^① *Anti-Oedipu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3. P. 29

里从马克思的相关论著^①中得到启示,指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这种主体性的、量化的劳动力被拘禁在私有财产——也即主体性表象的桎梏之下,而被解放了的欲望或者被非性欲化了的里比多也被精神分析学“私有化”在资本主义“核心家庭”^②的范围之内。他们认为,实际上,欲望与劳动力作为生产一般的两种范例,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欲望生产与社会生产分别通过里比多与劳动力的投注生产了我们身处其中的精神现实与社会现实,而“社会生产纯粹是而且仅仅是确定条件下的欲望生产本身”。

在德勒兹与瓜塔里那里,欲望生产与社会生产是以机器生产的方式运作的,因此,机器及其运作乃是欲望生产与社会生产理论的关键。在这一点上,两人同样受到了马克思的启发,^③但相对于马克思对机器生产所持的批判态度,两人主要是在积极的意义上来描述机器(主要是欲望机器)的运作的。他们认为,机器并不意指其他什么,更不是某种比喻。欲望机器是真正的机器,而且只能从它的运作中去定位。机器可以被描述为一种干扰系统或中断系统,它具有三个特点或者说运作方式。首先,他们假定存在着一种观念性的流,欲望流、文字流、货币流等等,而这种流会被机器切断、切割。机器作为对流的干扰或中断来起作用,但这种干扰或中断却不是持续性流的对立面,相反,干扰或中断是持续性流的条件。或者不如说,机器预设了、定义了作为观念性流的持续。这是因为每一个机器都是机器的机器:每一台作为中断的机器都连接着生产这一流的另一台机器,而它所生产出来的流又被另一台机器所中断。这正是德勒兹与瓜塔里所定义的欲望机器的生产性连接。其次,每一台机器都有符码(或话语)内建于、存储于其中。机器的中断或干扰实际上是其中的符码从表述链的脱落或者脱离。第三,定义机器的最后一种中断是剩余物以及享受这一剩余物的游牧主体。这里的剩余物我们不能从主体之渴求或者说缺失这一意义上理解,相反,应该把它看成是生产过程中最后残留的份额,在这一意义上,游牧主体正是生产过程中最后一种形式的机器;而游牧主体不是僵硬的社会体制之下服从性的个体,相反,这一

① 比如参考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关于“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的论述。

② “核心家庭”(nuclear family)的概念是美国人类学家G·P·默多克在1949年提出的,是指由父母和未婚子女组成的家庭模式。它被认为是近现代工业化时代的家庭模式,并取代了过去占优势地位的大家庭模式。

③ 德勒兹指出,马克思有三篇文本是我们需要一再阅读的,首先,《资本论》第一卷中关于剩余价值生产的章节,其次,《资本论》最后一卷中关于利润率降低趋势的分析,最后,《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关于机器生产的章节。参考Deleuze seminar 16.11.1971. *Web Deleuze*, <http://www.webdeleuze.com/sommaire.html> (accessed 24 June 2002).

主体的游牧性^①主要体现在它从各种社会压抑体制中逃逸出来,一方面消费了生产过程中(通常是经社会符码过滤后的)它所能汲取的一切,而另一方面则对社会体制、符码操作等构成了革命性的挑战。

而且,我们发现,在对机器运作的上述三个特点或方式的分析中,他们两人同样遵循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将社会生产过程从生产、分配、交换与消费四个阶段加以描述的思路,当然有所变化:他们实际上把分配和交换纳入了前述的符码操作之中。因为在他们看来,在前共产主义社会的任何一种社会形态之中,产品在社会领域及个人之间的分配与交换不可避免地受到各种符码的控制。另外,无论是他们所谓的符码操作或游牧主体,机器运作的上述三种方式都统一于欲望与社会生产的统一进程中。而这一点与马克思关于生产过程的描述实际上是一致的,分配、交换与消费同生产直接同一,而生产作为实际的起点将其他三者纳入统一进程之中,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马克思对他们欲望和社会生产理论的影响。

上面还留下的一个问题,即如何理解所谓“观念性”的流。这里涉及德勒兹前后期著作中一以贯之的“强度性”原则。欲望之所以是生产性的、肯定性的,是因为欲望是强度性的(intensive),而强度(intensity)则是一种肯定性的差异,是自在差异本身。强度性差异是德勒兹在早期著作《差异与重复》中着重探讨的对象。德勒兹认为,哲学(包括黑格尔的矛盾辩证法、甚至海德格尔)长此以来一直误解了差异,始终在否定性、消极的意义上,作为同一(主体)的对立面来理解差异。德勒兹从康德哲学那里借用了强度这一概念来描述肯定性差异及其综合。^②在《纯粹理性批判》“先验分析论”中,康德提出了“知觉的预测”这一先验原理,认为“在一切现象中,实在的东西作为感觉的一个对象具有强度的量,即具有一个度”。而这种量“只能通过向否定性=0的逼近来表象”。^③德勒兹在论述欲望生产时就借用了强度性概念,认为欲望机器正是一个个的强度的量,而所谓流,即正是强度性量的持续流。^④如果说精神分裂症是特属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病症,如果说它指示了

① 关于游牧主体以及游牧学,参考 *A Thousand Plateaus*, 12. 1227; *Treatise on Nomadology: The War Machine*, P. 351-423.

② 参考德勒兹《差异与重复》(*Difference et Repetition*)第一章及第五章,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68.

③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57-158页,第160页。(那里,intensive被译为逻辑学意义上的“内包的”)有趣的是,在对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解读中,海德格尔也是从这一原则出发重新界定了“现实”(reality)的内涵。参见其《什么是一个物?》(*What is a Thing?*)一书。

④ 我们当然也可以从这个概念中诊断出它的柏格森主义的来源。

包括资本主义社会在内的各种社会形态的绝对极限，那是因为精神分裂症所指定的正是这种强度性的、不受干扰的持续流。在这种意义上，妄想症（paranoia）正构成了欲望生产中与精神分裂症对应的另一极端，因为妄想症正是欲望的一种固化形式，并且服从于、服务于各种社会形态中的权威与教条。而德勒兹与瓜塔里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在于，如果说相对于各种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资本主义社会更具独特性，那是因为它在本质上是模棱两可的：它同时促进了欲望生产的两种运作方式，而前资本主义社会则通常尽一切努力为一方（妄想症）的利益而摧毁另一方（精神分裂症）。一方面，资本主义社会建立在各种流的汇聚之上（参考马克思所描述的自由劳动者与资本的相遇），这使得欲望生产从社会编码与表象所强加于其上的（对流的）捕捉（capture）^①与压抑中解放出来，而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社会通过各种临时性编码与表象——通常是前资本主义社会中编码与表象体制的死灰复燃与回收利用——以一种更严酷的方式重新捕捉并再次压抑了欲望生产。这种捕捉与压抑的范围从核心家庭与俄狄浦斯精神分析学，延伸到私有企业与官僚体制，并一直上升到专制国家本身，而所有这些建制都是持久性的。显然，德勒兹与瓜塔里是力图将经过他们改造的马克思主义与精神分析学结合起来，对资本主义社会作出上述独特的诊断和有深度的理论批判。

二

了解了德勒兹与瓜塔里上述理论和观点，我们对《卡夫卡》一书的理解就容易多了，因为在他们看来，卡夫卡的作品正是作为一台文学机器直接与欲望和社会生产联系在了一起。他们首先用欲望生产理论否定了卡夫卡作品作精神分析学解读，指出，即使是在著名的《给父亲的一封信》中，卡夫卡所关注的也不是精神分析学所一再强调的父亲作为统治者、立法者的意义，相反，卡夫卡将父亲的形象放大到一种荒诞的程度，并在与外部世界的广泛关联中将其与父亲的关系转变为“一种关于欲望，关于绝境与出路，关于屈从与矫正的微观政治学”，指出“与父亲的抗争其实是一场喜剧，不是悲剧”。^②德勒兹与瓜塔里认为，欲望不是从压抑而来，也不受任何外在的超越性权威（父亲、老板……）或律法的统治，并由此否定了长期以来对卡夫卡

^① 在《千高原》中，德勒兹与瓜塔里用整个一章来讨论帝国的这种捕捉机制，参考 *A Thousand Plateaus*, 13. 7000 B. G. Apparatus of Capture, P. 424-473.

^② *Kafka: toward a minor literature*, chap. 2, "An Exaggerated Oedipus", 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1986, P. 10-11

作品的解读中存在的三种主题，即法律之超验性、否定神学（或关于缺失之神学）以及先天的罪恶感。与众不同的是，他们在卡夫卡的作品中区分并揭示了三种表达成分，或者说卡夫卡文学机器中的三个组成部分：

卡夫卡文学机器中第一个组成部分是书信这一形式。德勒兹与瓜塔里在其中区分了两种主体：表述行为之主体，（subject of enunciation）即写书信的主体和陈述之主体（subject of statement）即书信所谈论的对象，并分析了这个组成部分的三个特点。首先，在书信中，卡夫卡并不是作为表述行为之主体来诉说自己的境况，相反，是陈述之主体承担了一种已经是虚构性的和充其量不过是表面性的运动。这正是书信作为少数文学的一种文类、作为欲望或者说作为对书信之欲望的第一个特点。其次，它的第二个特点也存在于这种二元性^①中：对于表述行为之主体来说最深的恐惧被转译为书信中的陈述之主体必须要克服的阻碍，即使这意味着毁灭。对于卡夫卡来说最大的恐惧即是任何形式的婚姻关系，而在书信中，他把这种恐惧转译为一种阻碍之拓扑学（topology of obstacles）（去哪？怎么到达？布拉格？维也纳？柏林？），或者，他通过对条件清单（list of conditions）的列数来排除掉这种恐惧。这就是所谓“一场斗争的描述”。^②第三个特点是，书信的欲望性运作不能阻止负疚（罪）感的回归，即使那仅仅是一种表面上的回归。因为，是陈述之主体感到负疚。罪恶感只是一种表面运动，一种虚饰性运动，而在这运动之下，则隐藏着魔鬼性同盟双方（通信者双方）之间的私密微笑。如果说在书信中存在着一种情感基调，那将是畏惧而绝不是负疚感。

卡夫卡文学机器中的第二个组成部分是短篇小说，而短篇小说的处理对象与主题则是德勒兹与瓜塔里定义的“生成—动物（becoming-animal）”。两位作者认为，即使卡夫卡有些短篇小说中没有动物的存在，它们也是动物性的，他们认为，“卡夫卡在他的房间里所做的，是变成动物（become animal）；而这正是短篇小说的本质对象”。卡夫卡自己也认为，动物是短篇小说最合适的处理对象，因为在他看来，动物本质上正是一个出路，一条逃逸线，即使这种生成发生在原地，发生在笼子里。也许“生成—动物”初听让人觉得匪夷所思，但他们认为这其实恰恰是卡夫卡短篇小说的核心，“生成—动物绝不

^① 这种主体之二元性的一个有趣的例子可以在短篇小说《乡村婚礼筹备》中找到，其中小说主人公觉得“我根本用不着亲自去乡下，没有必要。我只需把我穿了衣服的躯体打发去就行了”，而“我”则“躺在床上”，“形态像一只大甲虫，一只麋螂或一只金龟子”。《卡夫卡小说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39-140页。

^② 这里借用卡夫卡一篇短篇小说的题目。《卡夫卡小说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58-214页。

是隐喻性的。没有象征主义，没有讽喻。它也不是（上帝创世时的）某种缺陷或者诅咒，更不是什么罪恶的后果……生成一动物是强度之图。它总括了各种状态，每一状态都区别于另一状态，而所有这些状态都粘附在寻找出路的人身上。生成一动物是一条创造性的逃逸线，除了自己所是之外无所意指。与书信恰成相反，生成一动物清除了主体之二元性，甚至取代了主体本身，因为它另外组建了一种过程，一种独特的方法”^①。《变形记》中格利高利变成了一只甲壳虫，而这种动物之变通常被文学评论家确认为是一种文学寓言，旨在描述一种荒诞性，其实，这种强度性的流变反而暗示着一条逃离俄狄浦斯式家庭、逃离压抑性社会体制的解放之路，而这种流变之所以失败了（格利高利最终死于一只嵌在背上的苹果），是因为这种流变仍被家庭三角及社会体制所捕捉。而这正说明了“生成一动物”是危险的，同时具有暧昧的、模棱两可的不确定性。总之，在短篇小说中，两位作者再次使用了强度性概念，并与生成一动物结合起来。他们进而指出，在这种强度性生成中同样根本找不到负罪感的痕迹，相反，充斥其中的是一种逃逸之自由。

德勒兹与瓜塔里还用欲望生产理论对上述两个文学机器中的组成部分作了再次归纳，指出，无论是在书信还是在短篇小说中，都是欲望在运作，而绝不是负罪感或某种关于缺失之神学。但从欲望生产的角度来说，书信与短篇小说又都有其缺陷，它们无法构成欲望机器的生产性装配，也就是说，无法让卡夫卡的文学机器充分运作起来。首先，在书信以及一部分小说中起作用的只是一些机器性标识（machinic indexes）。机器性标识只是还未组装起来的机器性装配的一些符号，在这一阶段，人们只能辨认出一些独立的零件。比如，卡夫卡所描述的音乐狗，^②或者其他那些最后失败的生成一动物（包括《变形记》中变成甲壳虫的格里高利）。在这种情况下，零件即使能够运作也只是作为正是建造中的机器性装配的标识。其次，在另外一些短篇小说中存在着的则是抽象机器（abstract machine），这其中最好的例子莫过于卡夫卡

① Kafka: *toward a minor literature*, P. 35-36.

② 参考短篇小说《一条狗的研究》。“不知从哪个黑暗之处出来七条狗……我当时对狗类所特有的音乐天赋还几乎一无所知……因此对我来说，这七位伟大的音乐家的出现更为意外，简直惊心动魄。他们不说，不唱，全都像是憋足了劲保持沉默，却从这空荡荡的地方幻化出了音乐。一切都是音乐，他们的抬脚落脚，头部的某些转动，他们的奔跑与止步，他们相互间摆出的姿势，他们轮舞般的相互交错……”《卡夫卡小说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93页。

《在流放地》中的那台刑罚机器以及单身汉布姆斯菲尔德眼前跳跃的两只球。^①抽象机器是异化的、被抽离于社会、政治处境的机器，它无法运作，或者即使它们运作起来也只是趋向于自毁。德勒兹与瓜塔里认为，只有在卡夫卡的“无法完结的”长篇小说中，欲望的内在性以及欲望的机器性装配，换句话说，即才真正运作起来。

因此，卡夫卡文学机器中的第三个组成部分就是长篇小说。长篇小说处理的是欲望的内在性以及欲望的机器性配置或装配。在德勒兹与瓜塔里看来，这个部分同样没有任何的超越性、否定性或罪恶感。这里首先要明确他们所谓的装配(asmblage)的意思：“装配作为长篇小说的完美对象，具有两面性：它是表述之集体性装配；它是欲望之机器性装配”。^②他们认为，卡夫卡的《诉讼》^③或《城堡》或《美国》等长篇小说并不提供某种阐释或者社会表象，相反，它们构成一种实验，一种社会—政治调查，它们应被当作科学调查报告或者关于机器运作的实验报告来看待。机器性配置或装配现实地运作着，由此问题变成了在卡夫卡长篇小说中“它是如何运作的”“它有什么功能?”。下面且以他们两人对《诉讼》的评论、解读为例来说明这种欲望的机器性配置或装配。初看上去，这本小说中的一切都是虚假的，虚假的律师、法官掩盖了真相以及“无法接近的正义之运作”。但这种第一印象并不是决定性的，假象中存在着一种力量，^④用真或假来衡量正义也是种糟糕的办法。重要的是，人们认为存在着法律的地方，实际上只有欲望，仅此而已。正义是欲望而不是法律，事实上每个人都是欲望的一个办事员，不仅仅是那些调查员，不仅仅是牧师或者画家，甚至那些在《诉讼》中占去不少篇幅的暧昧的

① 参考《在流放地》及《布鲁姆费尔德，一个上了年纪的单身汉》。在前一篇小说中，一位“旅行者”从流放地的军官那里了解“一台独特的机器”的运作，并目睹军官被这台刑罚机器吞噬。在后一篇小说中，布鲁姆费尔德回到家里，发现“两个白底蓝条的赛璐格小球并排在木地板上上下下跳着，一个球着地，另一个就跳到高处，它们就这样不知疲倦地继续着它们的游戏”。这两个小球并且始终跟着这个单身汉，使他无法摆脱。

② Kafka: *toward a minor literature*, P. 81.

③ 一译《审判》。但“审判”暗示了某种法律的超越性以及严格的等级制，相反“诉讼”则强调了欲望之毗邻性的运作，参下文。这里采用的是上海译文出版社的译本《诉讼》。

④ 德勒兹在《侦探小说的哲学》这篇文章则着重论述了这种假象中的力量，具体到文学中，这种力量即是仿拟(parody)。

年轻妇女与乖张的小女孩^①也是如此。《诉讼》中颇具代表性的“在大教堂里”一章中，K手中拿着的书并不是祈祷书而是“这个城市的游览手册”，而法官手里的书则只包含一些淫秽的图片。法律写在一本色情书籍里。这里并不是暗示正义最终的虚假性，而是揭示正义背后的欲望本质：被告大多长相极为英俊，别人可以从其英俊得让人吃惊的相貌上认出他们；法官的行为乖张，说长道短“带着孩子气”；压抑的气氛不时被一句简单的玩笑打破，正义不是必然性，恰恰相反，是机会；蒂托雷利把正义的寓意描写为意外收获，长翅膀的欲望。正义并不是稳固的意志，而是游移不定的欲望。因此，他们两人认为，《诉讼》中贯穿着一种多重性的欲望，而这赋予全文一种色情力量。无论对于受压抑者还是施压者，压抑本身如果不是欲望就不会从属于正义。^②法庭当局并没有搜寻罪行，相反，他们为罪行所吸引、刺激。他们四下打探，到处搜寻，到处勘察；他们是瞎子，而且不接受任何证据，他们只重视那些走廊里发生的小事故，厅堂里的窃窃私语，议事厅里的私房话，门背后的噪音，幕间甬道里的耳语，一切表达欲望及其偶然性的微末的事件。因为正义即是欲望，所以它无法被表象、被戏剧化、被舞台化。^③因为建立在能指所指关系上的表象正指示着法律的超越性，而欲望则处在内在性的平面之中，它的运作以一种毗邻性为根据。也就是说，任何事情都发生在隔壁房间里（比如《城堡》就是一大堆零散而毗邻的陋室，类似于哈布斯堡王朝的官僚体系和奥地利帝国各民族的拼凑）。如果说每个人都隶属于法庭，从牧师到小姑娘都是法庭的帮办，那不是由于法律的超验性，而是由于欲望的内在性。K最终决定要找到正义，只能自己行动，追随自己的欲望，从一个房间到另一个房间。他将掌握表达的机器：起草起诉书，无限地书写，全力以赴地投入这一“几乎是无尽无休的”写作。恰恰在这个意义上，《诉讼》是一部无法完结的小说。内在性之无限领域代替了无边的超越性。法律的超验性是一部抽象

① 德勒兹与瓜塔里认为，这些妇女与小姑娘在卡夫卡的长篇小说中起着重要的“联接者”的作用，并且独自构成一种格外重要的系列。参考 Kafka: *toward a minor literature*, chap. 7, “Connectors”。这种年轻妇女角色在《城堡》《诉讼》与《美国》中所在多是，具体到《诉讼》中，“年轻妇女并不因为掩盖了法庭帮办的身份就不再是暧昧的人物，她们让法官、律师和被告人从同一种多重性的欲望中感受到同样的愉悦，从而暴露了自己的帮办身份”，也就是说，她们揭露了正义的欲望本质。

② 处在二战之后的理论背景中，《反俄狄浦斯》所要处理的一个重要问题即是“为什么人民甚至会渴望着对自己的镇压？”而福柯在《反俄狄浦斯》的前言中也指出，这本书的一个重要目的即在于“扫除每个人心中的法西斯主义”。

③ 比较黑格尔关于安提戈涅的悲剧理论：欲望与法律的对抗，或者按照辩证法双方最终归于一部更高的法律统摄之下。而德勒兹与瓜塔里认为，这绝不是欲望的运作机制，比如《美国》里的剧场不过是一条巨大无比的幕间甬道而已，一条取消了任何戏剧场面和表演的走廊。

机器，可是法律只存在于法庭之机能性配置的内在性当中。《诉讼》把超验性的所有依据都拆散为部件。在欲望当中，没有什么可供审判，法官自己就充满了欲望。诉讼只是欲望的一个内在进程，进程本身是一个连续体，然而却是建立在毗邻性之上的连续体。毗邻性与连续性并不对立，相反，邻接是连续的局部构造，可以无限延续，所以同样属于拆卸活动。旁边的办公室，隔壁的房间，奥尔加说：“你不要把这些挡板当作是一条明确的界线，巴纳巴斯也总是要我记住这一点……也有一些挡板他是可以通过的，它们和那些他还没有越过的挡板没有什么两样。”^①这样，欲望的内在性以及欲望的机器性配置、装配（或拆解）就成为他们两人解开《诉讼》《城堡》等长篇小说奥秘的一把钥匙。从上面德勒兹与瓜塔里对卡夫卡《诉讼》这部长篇小说的极为独特、新颖而又极为犀利、深刻的解读和评析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欲望生产和社会生产理论在文学批评中的成功应用。

三

正是在上面这种对欲望之内在性的阐述中，德勒兹与瓜塔里进一步定义了何为写作以及写作的功能：“写作具有双重功能：将一切都转译为（机器之）装配并拆解这些装配。”^②毋庸置疑，在他们两人看来，写作最重要的功能在于拆解，正是通过这种拆解，卡夫卡的作品在一种荒诞、仿拟与虚假之力量中完成了对于社会的不是批判的批判。也正是通过这种转译与拆解，卡夫卡的作品预告了未来的那些邪恶力量：法西斯主义、美国的技术专家统治或俄国的官僚机构统治。总而言之，“卡夫卡试图从社会表象体制中抽取表述的装配和欲望的机器性装配并拆解这些装配”^③。

如果说在上面一段我们理解了毗邻性欲望在内在性平面之中的“机器性装配”，那么另外一种德勒兹与瓜塔里称之为“表达之集体性装配”又是如何做到的呢？我们看到，机器的运作以建立在毗邻性之上的中断与连接为特点，除此之外，它还不断地生产着符码或者话语。欲望机器同时也是表达机器、写作机器，而表达与写作则是政治性的、集体性的。这就把我们带到了德勒兹与瓜塔里在《卡夫卡》这本书中提到的另一个重要概念：少数文学。少数文学这个概念是德勒兹与瓜塔里从卡夫卡那里继承并发展而来的，而卡夫卡

① 卡夫卡：《城堡》第十四章。

② 在《什么是哲学？》中，德勒兹与瓜塔里将写作的本质归结为组织（或结撰，composition），将文艺作品定义为一种组织性平面（plane of composition）。

③ Kafka: *toward a minor literature*, P. 46-47.

是在思考表达问题时提出这一概念的。卡夫卡并不是以一种抽象而普遍的方式来考虑表达问题的，相反，他将表达与那些被认为是弱势的文学联系起来，比如，华沙或布拉格的犹太文学。少数文学并不只是从少数族裔的语言而来，在大多数情况下，它反而是少数族裔在主流语言中所构建的文学。他们由此出发，分析了少数文学的三个特点：

少数文学的第一个特点即是在少数文学中语言为一种高度解辖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的倾向所影响。我们可以从几个层面来理解这种解辖域化运动：在政治层面上，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描述的脱离了原来封建领地的自由劳动者的流动即是一种解辖域化运动；而在语言学及文学层面上，解辖域化运动则指语言的运用脱离了能指所指关系及表象体制的统治，进入一种强度性流变中，卡夫卡自己使用的布拉格德语就是一种适合于少数文学的解辖域化语言（在另一种语境中，我们可以对比美国黑人对英语的运用）。此外，德勒兹与瓜塔里还肯定了卡夫卡对语言本身做了一种强度性的、解辖域化运用^①，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他们看出了卡夫卡对语言的理解与运用和布拉格学派截然不同，认为正是卡夫卡这种强度性的运用瓦解了作为表象的语言体制。

少数文学的第二个特点在于，在少数文学中一切都是政治性的。正如卡夫卡所言：“如果某个事件也常常用冷静去周密思考的话，人们仍然不能达到它的边界，在那边界处它与类似的事件联系在一起，通过政治人们最快地到达那个边界。是的，人们甚至渴求更早地看见这条边界，即使它还没有存在，人们到处都能发现这条边界……在主流文学中发生在暗处并构成结构中不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的事情，在这里就是在光天化日下发生的，在那里只是少数人偶尔关注的事情，在这里则紧紧抓住了每一个人，其重要性不亚于生与死”。^② 这也就是说，在主流文学中，作家的个人关注（家庭、婚姻等等）与其他个人的关注联系在一起，而社会因素则仅仅作为一种环境或背景服务于这种个人关注。而少数文学恰恰相反，它的受约束与限制的发展空间使得个人关注直接地与政治联系在一起。从这里我们也可以将少数文学与当代后殖

^① 参考德勒兹与瓜塔里对卡夫卡使用“Milena”这个名字的分析，以及：“我们不妨把那些能够凸显‘一门语言的内部张力’的语言成分笼统地成为强意词或语言张量……语言学家维达尔·塞菲阿将‘所有那些扩展到一个概念的限度或者冲破该限度的语言工具词’都称为强意词，它们显示语言正朝着它的极限发生可逆转的运动……少数文学的语言似乎专门发掘这些张量或强意词。瓦根巴赫曾经写过数页出色的分析，概括捷克语对于德语的影响……在卡夫卡那里……（这些运用）服务于一种新颖的简洁性、表现力、灵活性与强度”。Kafka: *toward a minor literature*, P. 19-23.

^② 《卡夫卡全集》，第6卷“日记”，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68页，“1911年12月25日”。该全集这一部分的翻译令人费解，且语句不通顺，这里主要依据卡夫卡作品的英译本。

民主义文学及理论联系起来,我们看到,德勒兹与瓜塔里关于少数文学的论述对于当下的文学实践来说仍具有强烈的针对性与鲜明的时代性。

而从上面这个特点立即引出了少数文学的第三个特点,即在少数文学中一切都具有集体价值。他们两人鲜明地指出:“特别是由于集体或民族意识‘在外部生活中常常是不活跃的且不断分解着的’,文学于是正面地肩负起这种集体的、甚至是革命性的表述行为(enonce)之角色或功能……如果说作家身处他自己脆弱的社会群体的边缘甚至置身其外,那么这一局面反而有利于他表达另一集体、为另一种意识及情感作出准备……因此,文学机器变成了将要到来的革命机器之继电器,而这绝不是出于意识形态上的原因,而是因为只有它才能满足集体表达的条件:文学是人民的事情。”^①我们看到,正是在与欲望生产和社会生产相联系的层面上,我们才可以理解文学机器这一概念;而偏处一隅的作家能够凭借着这机器的运作来完成少数文学的伟大使命——召唤那尚未形成的、新的人民。这又是德勒兹与瓜塔里从欲望生产和社会生产理论出发,在文学理论、批评领域推导出具有强烈批判性、革命性和人民性的结论。

实际上,通过对少数文学这一概念的论述,德勒兹与瓜塔里的文学理论最终指向对能指所指关系的批判,指向一种强度性的美学原则。如果说德勒兹与瓜塔里始终关心的是:作为文学机器的卡夫卡的作品,“它是如何运作的?”而不是“它意味着什么?”。如果说卡夫卡作品中见不到什么“社会批评”,那是因为关于意义之阐释问题以及“批评”等等始终局限在以能指所指关系为基础的表象体制(不管这表象是指向外部的还是指向内部的、是客体性的还是主体性的)之中。这一表象体制是辖域性的,而通过上面定义的写作的功能,或者说通过作为一种程序、实验的写作,世界以及它的表象都被带入解辖域化运动中,并沿着逃逸线飞翔。在《反俄狄浦斯》中,如詹姆逊所说,德勒兹与瓜塔里应用欲望生产与社会生产理论对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下了一组注解”。^②同时,他们两人也着重讨论了对应于各社会形态的表象体制。他们认为,以能指为核心的意指关系理论始终无法洗清它们的专制来源,能指之超越性只会导致“能指的霸权”。而与此相反,资本主义表象体制则摧毁了这种霸权(虽然以另一种方式带来了这种霸权的回归)。如果说专

^① Kafka: *toward a minor literature*, P. 17-18. 以及《卡夫卡全集》,第6卷“日记”,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66、167页。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字母K已不指代某一叙事者,也不指代故事人物,它代表一种配置,一个作用因子……”。

^② 参考詹姆逊《德勒兹思想中的马克思主义与二元论》一文,见王逢振主编:《詹姆逊文集》第4卷《新马克思主义》,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制主义的表象体制以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为基础的话，那么最适合于资本主义表象体制的则是叶尔姆斯列夫提出的语言学理论，“它是唯一一种与精神分裂流的本质相适合的……唯一一种现代的……语言学理论”。简单地说，叶尔姆斯列夫用内容与表达两个平面的互为前提取代了所指对能指的隶属，而这两个平面又分别有其质料与形式。比如说，在卡夫卡的作品中，德勒兹与瓜塔里选取了“低下的头”作为一种内容之形式，而与这种内容之形式联系在一起的表达之形式则是肖像或者照片。举例来说，在《城堡》的开头，K发现了一幅画像：“看上去那确是一张画像，是一个五十岁左右的男子的半身像。他的头向前胸低低垂下……已无法把头撑起来”。或者《变形记》中那幅“画上画的是一位戴毛皮帽子围毛皮围巾的贵妇人”的画像。德勒兹与瓜塔里认为，两种形式的这种联系并不是解释的对象，相反，它们引起了一种功能性的阻塞、消解了实验性欲望。那么，与此相反，在另一方面，昂起的头或冲破屋顶、天花板的头似乎构成了另一种内容之形式，而德勒兹与瓜塔里将这种内容之形式与“音乐性声响”这种表达之形式联系在一起。还是在《城堡》中，“城堡上面开始响起了一阵愉快的钟声，这阵钟声，至少在那一刹那间使他的心扑扑地跳动起来，因为那钟声同样也含着吓唬他的音调，仿佛是因为他想实现他暧昧的欲望而向他表示威胁似的。这洪亮的钟声不久就消逝了，继之而起的是一阵低微而单调的叮咛声……^①”。或者在《变形记》中我们发现格里高利被妹妹的音乐声所吸引。如此一来，我们就得到了两个等式：

$\frac{\text{低下的头}}{\text{肖像-照片}} = \frac{\text{被阻塞的、被压抑的或压抑性的、被消解的欲望，}}{\text{欲望的最小限度的关联 (connection)，童年记忆，}} \\ \text{辖域化或再辖域化}$

$\frac{\text{抬起的头}}{\text{音乐性声响}} = \frac{\text{高扬的、展开的、向新的连续开放的欲望，童年}}{\text{聚块或动物聚块，解辖域化}}$

这里有一个问题，即何谓“音乐性声响”？为什么我们不能简单地说“音乐”呢？德勒兹与瓜塔里强调说：“卡夫卡的兴趣显然不在于有组织的音乐或者音乐的形式（在他的书信和日记里，只能找到涉及寥寥数位音乐家的无关紧要的逸事）……卡夫卡感兴趣的是一种纯粹的、强度性的声响材料，这种声响材料始终与自己的销毁联系在一起——一种解辖域化了的音乐性声响，一声逃离了意指关系、乐曲组织、歌唱与语言的呼喊——音调断裂了，以便

^① 卡夫卡：《城堡》第一章。

能脱离那条仍太过意指化的链条。在声响中,最重要的是强度,而这样的声响通常都是单音调的、永远是非意指性的。”^①在这种意义上,如果说内容之形式上的对立(低下的头与昂起的头)还构成某种二元关系、使我们有可能无法摆脱“能指”的话,那么音乐性声响的情况则远非如此。音响在这里与其说是作为表达之形式来起作用,毋宁说,它是表达之一种不具形的质料。正是通过这种强度性的质料,作为内容之形式的低下或抬起的头、甚至肖像—照片都被带入了一场解辖域化的运动之中,就像卡夫卡《一份致某科学院的报告》中的猴子所说的那样,这些形式“连滚带爬地逃离(head over heels and away)”。这就回到我们上面所一再强调的,在德勒兹与瓜塔里那里,这种解辖域化运动的促进因素正是欲望,而欲望与声音一样,都是强度性的。

我们认为,这种对强度的强调,正是德勒兹与瓜塔里文学与美学理论的核心。在《千高原》一书中,两人详细地阐述了这种强度美学或者说生成论美学。何谓“童年聚块或动物聚块”?如何理解“解辖域化运动”?童年聚块正是由一种生成—童年组成,它与(作者)对童年的回忆无关,它也不是对童年的温情叙述。同样,动物聚块由生成—动物组成,这不是对动物的模仿或者是某种关于动物的象征主义。^②这是一种强度性的流变,在这流变之中,创作者或欣赏者都被卷入了一场解辖域化运动,都被带入一种沿着逃逸线的飞翔之中。^③而在这种运动与飞翔中,生成了机器生产的最后一种产物:游牧主体。这种主体也许是孤独的,甚至在本质上即是孤独的,比如偏居一隅、始终单身并渴求单身的卡夫卡^④就是这样。但正是通过这种原地的生成与运动,通过游牧主体之欲望对社会领域的直接投注,偏处一隅的作家与广大的社会群体(而且首先是那些弱势群体:妇女、儿童、甚至动物)最紧密地联系起来,并实践着少数文学的伟大使命。

以上我们通过对《卡夫卡》一书的解读,并结合《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症》等著作,对德勒兹与瓜塔里的文学理论做了初步介绍和评析。德勒兹与瓜塔里在马克思主义启发下对社会关系及其文学理论指向的分析当然不止于

① Kafka: *toward a minor literature*, P. 4-6.

② 以上参考 *A Thousand Plateaus*, 10. 1730; *Becoming-Intense, Becoming-Animal, Becoming-Imperceptibl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7, P. 232-309.

③ 写作意味着一种逃逸、一种飞翔、一种生命的出路,这种论点在德勒兹的著作中所见多是,比如参考其《访谈》一书。

④ 德勒兹甚至以“单身机器”称呼这种文学写作中的游牧主体,比如普鲁斯特、卡夫卡等作家,参考《反俄狄浦斯》第一章。

此，比如上面提到的两人对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下的“一组注解”^①。在对专制帝国主义及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与比较中，德勒兹与瓜塔里尤其着重论述了当代条件下的帝国主义运作机制，而这一切在卡夫卡的作品中也有所反映（比如关于卡夫卡作品中两种官僚体制之结构的对比性分析）^②。但我们相信，通过上面的介绍与评析，我们已经基本上掌握了德勒兹与瓜塔里基于马克思主义之上的社会与文学理论的论述线索与理论要义。同时，我们看到，对于两人的这种文学理论以及其后所隐藏的理论预设，存在着很多争论。首先，与德勒兹关系密切的法国另外一位著名当代哲学家福柯就曾经对德勒兹与瓜塔里的“欲望”概念表示过异议，认为这一纯粹生产性的欲望似乎是不可能的。而这也正是我们对《卡夫卡》一书所呈现的文学理论的某种关切所在：德勒兹与瓜塔里对欲望之运作机制的分析诚然精辟、深刻、令人叹服，但如果把赌注全部押在欲望身上，这是不是有点冒险？另外，詹姆逊在前引论文中则将讨论重点放在“德勒兹思想中的二元性”之上，这也正是德勒兹与瓜塔里的理论容易为人所诟病的地方。当我们阅读《反俄狄浦斯》时时常会有这样的疑惑：欲望以及欲望的机器性生产到底导向哪里？对于欲望生产与社会生产的关系，以及德勒兹与瓜塔里描述的“出路”詹姆逊也确实表示了他基于善恶二元论基础上的担忧。^③ 诚然，对德勒兹与瓜塔里思想的介绍与引入还只是初步的，但带着如上这些问题进入对德勒兹与瓜塔里的阅读，也许会带来对其思想的更深入理解吧。

① *Anti-Oedipus*, chap. 3, “Savages, Barbarians, Civilized Men”.

② *Kafka: toward a minor literature*, chap. 8, “Blocks, Series, Intensities”.

③ 参考詹姆逊《德勒兹思想中的马克思主义与二元论》一文，见王逢振主编：《詹姆逊文集》第4卷《新马克思主义》，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